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2.012

■ 期刊文献的广义修辞研究

特约主持人:谭学纯 教授

主持人寄语

作为学术史的事实或事件,通常是期刊记录的事实或事件。即便是口述史,它的传播形态也不是音像,而是记录下来的符号集合。在这个意义上,期刊即信息。(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信息”)期刊本身就是具有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意义的文本。期刊是文献信息的传播者,同时也是所传播的文献信息的生产者,有没有经过传播的文本,如何产生意义,产生什么样的意义,其间的差别可能超出人们的想象。期刊在聚合轴上为修辞研究汇聚文献资源,在组合轴上为修辞研究提供信息选项。大数据为检索期刊文献来源带来了速度与便捷,以检索词为检索目标的信息分类和整合,以及不同数据库的选用,既可以消解期刊的界限,也可以还原期刊的存在形式。修辞介入期刊变迁的过程,同时又是期刊文献话语变迁表征。期刊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期刊的历史使命和现实担当、期刊传递的国家意志、政治运作,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化资本的博弈如何体现为话语的权力?如何渗融于期刊的内外空间?如何由言内之意和言外之意推助言后行为——产生可预期或不可预期的社会学后果。本期一组文章探讨此类问题,希望能够提供一种独特的观察与解释。

期刊文献话语背后^①

——以《〈文艺学习〉的广义修辞学研究》为观察对象

谭学纯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以《文艺学习》作为目标期刊,聚焦期刊文献话语进行广义修辞学研究,描述60多年前意识形态宣传和文艺创作与接受关系中的期刊身份、功能及修辞策略,考量历史语境中文艺“生产-消费”与修辞行为的互动、展示文艺研究和修辞研究边界移动所开放的场域,阐释《文艺学习》的历史使命和担当及其思想动员传递的国家意志如何体现为话语的权力,可控的言内行为如何产生不可控的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广义修辞学视角的探索为换一个角度观察与解释20世纪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重要的文化事件,提供一种可能性。

关键词:《文艺学习》;期刊文献话语;广义修辞学;狭义修辞学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2-0076-05

我曾借《文艺研究》一角谈及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广义修辞学转向的学术逻辑。

全球视野中的当代修辞学,多方位地介入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本土风景中的当代修辞学研

究对此做出了反应。本土反应的阶段性学术影像呈现的研究热点,可以理解为接受美学意义上的“召唤结构”,每一次填入“召唤结构”的中心话题,都会召唤同类学术文本的批量生产和读者关注点的相对集中。避免“召唤结构”堰塞湖与学

^① 收稿日期:2018-09-12

作者简介:谭学纯(1953-),男,安徽芜湖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术研究创新性的要求互为因果,驱动了学术研究的修辞学转向,其学科能量主要来自两个学科:文艺学和语言学。

文艺学科作为“转向”的中坚力量,符合国内学术当代走向中文艺学科思想活跃的特点及其在理论建设中的惯常身份——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国内学术研究的几次转向,都由文艺学发端。转向的标志是频繁变换填入“召唤结构”的主题和关键词,“修辞学转向”是其中一次持续时间较长的学术填空。

“修辞学转向”的主要联袂力量是语言学研究,受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思潮的影响,国内语言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自然科学的形式感和技术路线,这对于具有深厚人文传统的修辞学研究来说,面临着不同的学术选择:或者割断文史哲不分家的人文传统,向语言学研究的技术倾向靠拢,以维系现行学科目录中修辞学隶属语言学下位学科的归属感;或者承续中国修辞研究文史哲不分家的人文传统,同时吸收现代语言学的滋养,向共享学术空间突围。修辞学研究突围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限于狭义的修辞技巧分析,较多地倾向于广义修辞观^①。

从广义修辞学视角研究《文艺学习》,是上述学术背景下的知识生产。

选择期刊作为广义修辞学研究对象,是因为:文艺研究进入成果密集区,需要进行新的空间开发,期刊研究是有待进一步开发的价值洼地。期刊在聚合轴上为修辞研究汇聚文献资源,在组合轴上为修辞研究提供信息选项。期刊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期刊的历史使命和担当,思想动员及其传递的国家意志,如何体现为话语的权力?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后果?此前较少有这方面的探讨。

选择《文艺学习》作为广义修辞学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份以文学和艺术为话语场域的刊物从诞生到停摆,不足四年。从停刊到复出,冷冻了30年。刊物成为关注焦点,是20世纪50年代,作者阵容包括了当时乃至现在都是高关注度的作家、诗人、理论家、批评家、学者、出版人,期间刊发过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关注度很高的作品和理论,如邓友梅《在悬崖上》、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绍棠《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也刊发过针对高关注度作品的高关注度讨论。讨论

的言内行为是可控的,不可控的是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引人瞩目的事件如关于《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的讨论,始料未及地引起了国家高层的关注。刊物从主动发表干预生活和探讨理论问题的作品,到多少有些被动地组织批判和自我批判;从因为“发表有原则性错误的文章向读者道歉”,到“检讨刊物的资产阶级方向”,温和的讨论转向话语暴力,是学术表达向非学术表达的剧情反转,刊物“被中断”的无奈及此后漫长的空窗期和主编的命运^②,是剧情反转的延伸。当文艺衍生出非文艺的假设时,《文艺学习》为表达一个时代的文艺经验和政治热情保留了集体记忆。挖掘尘封的记忆,重返历史风景,必然注入对历史的当代审视,如何描述共和国诞生初期意识形态宣传和文艺创作与接受的关系中《文艺学习》的身份、功能及修辞策略?此前也较少有这方面的探讨。

二

学术研究是减少重复性、凸显区别性的游戏。

区别于近年渐成新热点的期刊研究的学术面貌和观察角度,《〈文艺学习〉的广义修辞学研究》从期刊文献话语审视期刊,汇聚《文艺学习》从1954年出场、到1957年与《人民文学》合并而退场期间的全部文献,重点分析《文艺学习》画页解说词、青年文学创作话语、文学批评话语、读者来信话语、编者话语。全书主体部分第二至六章,均以关键词句为观察窗口,例如,从人称代词分析《文艺学习》创作主体身份与话语修辞,从“反问/否定”分析《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批评语句的修辞结构,从“应该/不应该”分析禁止句型的修辞特征,从“大人物”与“大批判”分析话语的逻辑和批评的力量如何被权力重新定义。《文艺学习》是兼创作、理论与批评于一身的话语集散地,也是影响广泛的话语频道。聚焦话语,尤其是聚焦关键词句,是一个独特的学术观察角度。

区别于同样聚焦关键词句的狭义修辞学研究,《〈文艺学习〉的广义修辞学研究》走出了“就语言谈语言”的分析路径,从“话语世界-文本世界-人的精神世界”(修辞功能三个层面)的立体架构和“表达者-接受者”(修辞活动两个主体)的互动行为中进行综合考察。

从修辞功能三层面考察,注重关键词句在目

^①谭学纯:《新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广义修辞学转向及其能量与屏障》,《文艺研究》2015年第5期。

^②韦君宜:《思痛录》,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黄秋耘:《风雨年华》,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两书各有几十处回忆《文艺学习》的文字,作者分别是《文艺学习》主编、副主编。

标文本建构的话语系统中是否具有支撑文本整体和建构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功能,或者说,关键词句指向的话语世界本身,可分析性是有限的,话语世界不是抽象概念和抽象语义构筑的世界,而是文本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定义的此时此刻的话语世界。米兰·昆德拉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认为《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组成人物编码的若干个关键词,在另一个人的存在编码里有不同的意义^①。每个人(例如,特丽莎和托马斯、弗郎兹和萨宾娜)的存在编码不同,决定了组成人物编码的关键词的意义不同,这些词的词典语义被文本重新释义^②。后者以新的语义形象召唤新的话语组合,躺在词典释义系统中的词语,一旦在文本中活起来,即被锁定为广义修辞学在文本中跟踪的目标语词。其语义往往从不在语用现场的固定义位溢出,在语用现场的自设义位重新出场^③,释放推动文本叙述和参与建构人的精神世界的能量。作者据此观察与解释关键词“悬崖”之于《在悬崖上》的标题语义、文本叙述要素与修辞结构、人物形象义素与道德评价、主题投射方式与文本修辞的意义。随之而来的疑问是如何减少关键词句选择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我主张用比较或替换的方法检验:所选目标文本中的关键词句,删除或替换,这个文本是否仍然成立?文本内外交际系统中人物的精神世界是否被改变?如果删除或替换关键词句,目标文本仍然成立,则被删除或替换的关键词句只是局部的的生动形式;如果删除或替换关键词句,目标文本不能成立,文本内外交际系统中人物的精神世界被改写,则从反面证明所选关键词句推动文本建构的叙述能量,以及参与主体精神建构的能量。

从修辞活动的两个主体考察广义修辞学视野中的期刊研究,动态地审视编者、作者、读者的共同在场及其身份转换:当作者以表达者身份发言时,编者和读者都是接受者;当读者以表达者身份发言时,编者和期刊作者都是接受者;当编者以表达者身份发言时,作者和读者都是接受者——编者话语即便以“告读者”“答读者”的形式呈现,作者和读者也都是编者共同的接受者,这意味着《文艺学习》“道歉-检查-检讨”的话语升级,实际上是在编者-作者-读者的关系中逐层弱化编者话语权的修辞策略。

以上围绕关键词句微观分析和契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宏观把握相结合,考量历史语境中文艺“生产-消费”与修辞行为的互动、展示文艺研究和修辞研究边界移动开放的场域,为换一个角度观察与解释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史、思想史上重要的文化事件,探索一种可能性。

三

附录1~3是指向书名关键词的文献汇集,同时作为副文本,参与本书正文本的学术建构。

附录1穷尽《文艺学习》1954年创刊到1957年停刊期间的全部文献,包括6个板块:(1)封面、画页、插图、封底设计;(2)文艺创作;(3)文艺理论批评;(4)文艺知识普及;(5)读者来信;(6)编者的话。附录1的目录层次可展示《文艺学习》当时的全貌。附录2汇集1954~2018年间与《文艺学习》相关度较高的研究文献目录。附录3辑有《广义修辞学》出版以来与广义修辞研究相关度较高的文献目录,因为选文依据是广义修辞研究的相关度,而不是广义修辞学研究本身,所以虽然不代表我的观点,但尊重作者的选择,这或许可以看做《〈文艺学习〉的广义修辞学研究》理论资源的一种自我注释,所涉文献有的运用广义修辞学的系统理论,解决作者拟解决的问题;有的选用广义修辞学的局部理论,解决作者拟解决的问题;有的依据广义修辞观选择相关理论解决作者拟解决的问题,也有对广义修辞学论著的评价或批评。目录中的作者很多我素不相识,只在学术文献中相遇。相识或不相识的作者注意的是自己拟选择的理论或评价的论著,我注意的是被选用的广义修辞学理论的解释力能不能进行差异中的有限推导。从解释的有效性说,一种解释框架应该可推导。推导是一种抽象,理论上抽象性越强,可推导性越强。但过度抽象可能连带过度推导,而过度推导的结果,可能弱化解释力。鉴于修辞研究的特点,我倾向于差异中的有限推导:强调差异中的推导,是重视研究对象作为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强调有限推导,是避免过度推导或“强势误读”^④。解释框架可推导,是从一千片树叶中可以抽象出一个共同的结构,但修辞却需要解释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在“共同结构”和“差

①M·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1995,第27-28页。

②关于“词典语义”和“文本语义”的精细论述,参见孙绍振:《名作细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258页。

③谭学纯:《存在编码:米兰·昆德拉文学语言观阐释》,《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2期;《语用环境中的语义变异:解释框架及模式提取》,《语言文字应用》2014年第2期。

④张雅卿,刘亚猛:《罗蒂的话语策略与新实用主义的崛起》,《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异性”之间,探索解释框架的可推导性。

差异中有限推导的另一个观察点是附录3辑录了《广义修辞学》出版以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修辞研究的立项选题目录,很多选题使用“广义”的“修辞”概念^①。这让人想到巴赫金对修辞研究瘦身的批评:“修辞学对自己要研究的课题,失去了真正哲理的和社会的角度”,主张修辞研究从“书房之内”向“书房之外”延伸^②。事实上,书房之外的信息不可能真正被书房之内的言语技巧截断,书房之外的景观总会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书房之内的纵深,屏蔽书房之外的世界,无啻于折叠书房之内的空间。巴赫金批评沉于“细微末节”的“书房技巧”,与国内语言学界诟病修辞研究“小儿科”同声相应。虽然巴赫金的批评是针对长篇小说话语的论述,但理论指向不限于长篇小说话语。不过作为《广义修辞学》作者及理论与实践的推动者,我并不因为上述学术文献的理论选择及巴赫金批评拘于“书房技巧”的研究,而误读偏重言语技巧的狭义修辞学。巴赫金看到了修辞研究不能限于书房之内,看到了“修辞技巧”不等于“修辞”的外延,重视“修辞统一体”^③,但巴赫金的尖锐批评,又似乎从“修辞”卸载了“修辞技巧”,所以广义修辞学的理论框架包括但不限于狭义的修辞技巧。偏重“技巧中心论”和“表达中心论”的狭义修辞学,与兼涉“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兼及“表达者-接受者”的广义修辞学各自构建的学术形象各有学理。二者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共同彰显学术研究的不同可能性,并互为镜像:狭义修辞学作为广义修辞学的背景,映衬了后者的立论及其验证。狭义修辞学的学术传统,提醒广义修辞学在探索之途适时回望。广义修辞学的理论与实践,提示狭义修辞学在自我坚守中不要遮闭了面向更宽广的世界的窗口。广义修辞学的探索,并不意味着狭义修辞学的衰微。从狭义修辞到广义修辞的历时演化,会以狭义修辞观和广义修辞观的共时同现方式并存。狭义修辞学和广义修辞学,都应该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信,也都应该具有直面自身局限的理性和自觉,并勤于自我更新,敏于自我提升。

附录3搜集的文献来自不同学科,作者在相关“说明”中表示:

本书读者在附录3中,可追寻广义修辞学的

研究意识(广义修辞学“研究什么”“怎样研究”“为什么这样研究”),可考量十多年来广义修辞学融入中国学术生态的话语实践(期刊话语的修辞研究、意识形态的修辞观察、文体生成功能的修辞理路、中西文论的修辞阐释、辞格的修辞分析、中国修辞学科中的广义修辞研究等),可继续在“小同行”(修辞学作为三级学科)“大同行”(修辞学归属于二级学科语言学)和“超同行”(交叉于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以及相关的非中文一级学科,如哲学、法学)的学术共同体中,探索中国修辞研究的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和前沿意识。

不同学科针对不同对象的广义修辞学研究,能否激发学科内的知识生产注视学科间的知识生产?相关学科的研究和广义修辞学的信息交换及其跨界生产释放的能量,如何重建二者交互生长的开放性空间?从修辞技巧延伸至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的广义修辞研究,如何操控跨界游戏?在这方面,作者董瑞兰在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阶段分别接受过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训练,或许有一点跨界的便利。我也一直倾向于研究生读硕士和读博士阶段、或博士生学习和博士后合作研究阶段,最好接受不同学科的训练。

四

《〈文艺学习〉的广义修辞学研究》是董瑞兰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最终成果,从2014年立项到项目成果付梓,学术读写频繁转换,辛劳的付出和获得感同在。作者保持了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阅读与写作惯性,闽江学院讲台和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是她家庭生活之外的第二时空和第三时空。人与人的差别,往往在第一时空和第二时空之外。因为每个人都有家庭生活,每个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都要工作(全职太太承担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工作),但每个人有不同的第三时空。董瑞兰尊重第二时空的劳资契约,工作之余能够自我调节的,只能是以第三时空压缩第一时空。低设家庭生活的温度与浪漫指数,承接学术读写的重压,可能招致同情或不解,但可悲的不是社会用同情或不解的眼光斜视学术,而是假面学人用猥琐褻渎的方式僭越学术。如果说学界吐槽水煮学术更多地是叹惋什么样的

^①董瑞兰,毛浩然:《25年来中国修辞研究的关键词词频统计——基于国家社科与教育部社科课题立项数据》,《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②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③巴赫金:《长篇小说的话语》,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机制使得精英游戏变味成广场舞;那么怒怼学术猥亵则反讽学术认同的价值指标,追问什么样的价值观毁损了学术正义、接纳了伪学术和反学术、推助了学术红灯区的畸形繁荣。在学术生产、学术资源、利益分配的关系日趋紧张的当下,我为作者守住底线的学术辛劳感言,也就更高层次的学术要求写几句建议。

学术研究的难度常常超出初始想象,因此最后定型的文本自然会留有一些似可推进的发掘点,例如,作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个人/集体”的图像语义和文学批评的“个人话语/集体话语”,是否可以深入图像叙事和语言叙事的互文性空间继续发掘,图像和语言互相指涉,互相确证,互相补充,图像再现的画面和语言唤起的图像,在相邻的位置、相继的关系中,共同参与话语的意义建构,引导话语的意义解读。如果链接话语主体“我/我们”的语义指向,考察“个人/集体”的符号自我和真实自我,“个人话语”如何被“集体话语”包装或复制?“集体”声浪中如何插入“个人”音符?很难设想拒绝集体话语资源的“个人话语”,正如很难设想完全压制个人话语经验的“集体话语”,在“个人/集体”的二元秩序之外,是否存在暧昧空间或叠合影像?再如分析作为读者的“工农兵”身份认证,能否关联文本人物“工农兵”的身份建构和作为文艺政策的“工农兵方向”?“工农兵”是由劳动阶层+军事集团构成的身份类别,是

建立与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的人力资本,“工农兵”身份认证的实质是政治认同。但文艺政策的“工农兵方向”和把握这个方向的文艺工作者的“工农兵”身份不具有对等性,工农兵的形象塑造,工农兵作者和读者参与文艺生产与消费,以“工农兵”趣味审视文艺,势必要求《文艺学习》寻找契合“工农兵方向”的表达,或者说契合那个时代的表达。就此放大观察,如何解析共和国童年期《文艺学习》的刊物使命?书中分析编者自我反思的话语升级,能否探寻《文艺学习》试图在文艺干预生活和文艺的政治干预之间构筑某种平衡的努力,这也许是更值得细察的编者修辞策略。文艺和政治,以不同的方式干预生活,两种干预生活的交叉处,也是文艺与政治的叠合处,因此文艺与政治不宜简单切割。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文艺的政治干预强势出场,是文化资本博弈的结果,但可能在历史循环的意义上,对同一文艺产品给出“香花-毒草-重放的鲜花”否定之否定的价值评判。深入到这个解释空间,有更高的学术含量,也极具理论诱惑。希望能够在本课题的延伸探讨——同为董瑞兰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广义修辞学视域中的《人民文学》(1949~1999)话语研究”最终成果中呈现为逻辑化的学术叙述。

有期待,才有再出发的学术冲动和话语欲望。

Behind the Discourse of Journal Literatures:

Taking *The Study of Generalized Rhetoric in Literary and Art Learning* as an Observation Object

TAN Xue-chu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Literature and Art Learning* as the target journal, this paper, focusing on the studies of the discourse of journal literatures, analyzes its journal literature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nded rhetoric. The study has described the journal identity, function and rhetorical strategy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ideology propaganda and literary creation and acceptance over 60 years ago. It has consider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terary “production-consumption” and rhetorical behavior in historical context, displaying the newly opened research area created by the boundary movement of literary studies and rhetorical research. Besides, the study has explained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Learning* and how the mobilization of ideology in the journals that show the will of the state presents the discourse power, and how the controllable locutionary acts produce uncontrollable illocutionary acts and post-speech behavior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xtended rhetorical perspective makes it possible to observe and explain the important cultural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thought in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Literature and Art Learning*; discourse of journal literatures; generalized rhetoric; rhetoric in a narrow sense

(责任校对 钟丽)